

# 以现实问题研究促进基础理论研究——“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哲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共同主办、国立华侨大学协办的“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于今年4月24—27日在福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40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期间，与会者围绕“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在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

##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代表们指出，首先应当充分肯定，邓小平捍卫、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前进。邓小平曾在毛泽东领导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共同奋斗，并且是毛泽东开辟的事业的理所当然的继承者。毛泽东生前曾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正在于这个领域。

代表们指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及时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与此同时，邓小平针对否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错误思潮，坚持科学理解、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保证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与会代表还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中，邓小平坚定地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为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代表们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坚持从不断变化的国内外背景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表现于各个方面。

例如，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提出“东西南北问题”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和世界重大现实问题、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科学坐标。

又如，从我国具体国情和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提出并实事求是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寻求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的现实途径，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一贯重视文化建设的方向性问题。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他就深刻地阐述了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对于如何粉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国内反动势力的买办性文化，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这些指示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他根据现实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强调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坚决反对文化事业中“一切向钱看”和精神产品商品化的不良倾向，尖锐批评某些文化工作者堕落为“惟利是图的商人”，为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正确方向。

## 二、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要以现实问题研究促进基础理论研究。

代表们指出，要继承邓小平的遗志，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最紧要的就是必须研究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诸如“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社会分层问题，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问题，社会结构问题，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问题，如何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的意识形态战略问题，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问题，等等，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来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按照邓小平“从人类的高度”看待发展问题的观点，从东西南北关系的角度，特别是南北关系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脱离南北关系讲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

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绝不能回避问题，而是要通过分析和解决问题来实现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现在理论界要反省的恰恰是如何从虚假问题中解放出来，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代表们还指出，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现实性和学术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有脱离现实的“纯”学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论与实践是内在统一的。

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正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从当代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出发，所以才能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作为现实生活主体的中国人民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热情和积极性、主动性，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而中国人民在创造历史、改变生活的过程中同时获得了自身的自由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在其生成发展的过程中内在地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邓小平理论对现实生活的作用，是以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为切入点的，正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实现了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改造。二是对自身的批判。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现实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它的自我批判性和自我超越性。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自我批判、自我改造、

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自我创新、自我发展。

有代表指出，必须反对和杜绝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阳奉阴违的态度。例如，邓小平在1983年就尖锐地批评了“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可是至今有关部门还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旗号下大搞精神产品商品化，某些“理论家”不遗余力地为此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口头上大讲“三个有利于”，实际上却为严重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行为歌功颂德；在“解放思想”、“观念变革”的幌子下大搞思想走私，贩卖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等。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声誉，我们绝不可与这种恶劣风气同流合污。

（高飞乐刘思明）

责任编辑：刘奔（《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